

香港教育風雲三十載

三三四學制和課程改革

與黃玉山的訪談

訪談日期：2014年12月27日

教育風雲人物檔案

黃玉山教授，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及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並曾擔任多項教育公職，包括 課程發展議會主席(2001-2007)、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2001-2007)、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委員(2003-2007)、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2005-2011)等。

1. 參與 2000 年教育改革的緣起

【戴】我知道 2000 年的教育改革你也有參與，特別是基礎教育，為甚麼當時你會參與的呢？你怎麼判斷當時改革的形勢？

【黃】那時我在大學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教統局的朋友邀請我加入中三以下的教育小組，那時是 1998 年底、1999 年初。最初我並不熟悉基礎教育，由於以前我曾任中學老師，對基礎教育的情意結一直揮之不去，所以一有機會我就參加了。

【戴】你甚麼時候當過中學老師？

【黃】大學畢業之後的第一年，當了一年的中學老師，之後去了加拿大讀博士學位，因為科研一直都做得很順利，所以就把精神放在大學發展。其實當時我去讀博士並沒有想過會讀五年那麼久，一開始我只打算讀一年，之後回來繼續教書，但想不到研究工作做得很順利，發表了不少文章，也改變了我的興趣。

【戴】為甚麼會出現 2000 年的教改，除了是因為新的特區政府成立外，有些人認為是以以前的教育出現了很多問題，不改不行，也有人認為不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好，而是世界變了，那你覺得香港教育改革的原因是甚麼？

【黃】我覺得世界變了是主要的原因，當時經濟全球化，世界地球村化，全球信息化，科技發展，加上環境污染等等，整個知識型的經濟很急速地套入香港當中，所以這是教改一個重要的拉力。當然也有內在原因，以前我們的學生太早文理分科，文理過早分流，加上我們學生的基本能力比較弱，考試的壓力沉重，中學課程又欠缺選擇，如果不改革是很難去適應知識型經濟的到來。至於特區政府的成立，我個人認為是較為其次的因素，當時董生有意發展教育，很多原因加起來，促成了教改。教改可說是香港四、五十年以來，在教育界一個重大的改變，時間長、幅度廣、影響深。

【戴】那麼有沒有成績呢？

【黃】首先不要那麼快說成績，我們先談談教改的理念，世界變得多元，我們除了要求學生自學，亦提出要終身學習，並擁有應變、創新和溝通的能力，因此當時出現了一句說話「樂善勇敢」，希望同學能夠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包括兩文三語，勇於承擔對社會有責任，另外要有創新的頭腦，以適應知識型經濟的到來。所以，我認為「樂善勇敢」是很有意義的，不過不知道為何後來並沒有人提及。後來我與外國的教育界朋友談及這理念，他們都很贊同，可惜我們後來並沒有很大力去推動。整體而言，當時我們提出了一些目標，由於世界變得很快，挑戰了一些我們傳統固有的觀念，以前我們擁有一技之長就足夠，但現在世界變了，對工作不再是從一而終，所以，當時的教改可能提出了一些比較理想主義的東西。2003 年 9 月所出的「藍天白雲」報告書，1999 年 1 月我們已推出了教育目標，9 月就出了一份「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報告書，一年後就正式出現了「藍天白雲」，即「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報告書，它勾勒了整個教改的主要內容。不過，我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高中課程，因為高中課程比較重要，其中提到希望達到七個學習目標：

1. 善用兩文三語
2. 具有廣闊的知識基礎，了解個人、社會、國家、全球的生活問題
3.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且具備國際視野
4. 尊重多元文化觀點，並且成為有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5. 要掌握資訊科技
6. 養成正面的學習和工作態度
7. 有健康的生活，包括積極參加體藝活動

現在看來，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但是頗為全面的。如果要看教改

有沒有成績，我們可以把這些當作是一個標準，現在已經過了十年，我們做不做得得到呢？我認為有些是做到的，有些則做不到。例如，兩文三語似乎也做得不太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有些則做得不錯，例如學生比較活躍，批判性的思考是有進步的，至於反思和獨立思考，則還未做到，丁肇中教授曾經說過，科學是多數服從少數，只有少數人把多數人的觀念推翻以後，科學才能向前發展。所以我們不要害怕少數人，我們要敢於提出與別人不同的看法，這才是獨立的見解，但這一點我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至於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我們還是「止於至善」，還要做得更好。但整體而言，現在學生的思考、溝通能力都進步了，但是知識面卻不夠廣闊，知識面要廣闊，才能融會貫通。

2. 三三四學制改革的成與敗

【戴】你回看這十多年來的高中和大學的課程改革，如何去評價當中的成與敗？

【黃】我認為三三四學制是成功的，大學變成了四年後，整個空間是活躍了起來，例如課程寬廣了，每所大學除了學生自己專修的課程外，其他配套課程，比較普通的課程也多了很多，這對於學生個人的成長和知識的擴闊也有好處。另外，變成了四年之後，空間也多了，例如去交流，還有服務學習、社會了解等等，這些都是好的。對於通才的培養，也有益處，當然也有人認為，現在中六畢業就進大學，學生年紀小，知識面不足，中學學得不足夠，進了大學以後還得要補課，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小問題，之後可以慢慢去克服。現在，我們也發現這批中學生很活躍，能言善辯，例如他們做的介紹（presentation）做得很好，幻燈片做得很漂亮，但是只要問他們深入一點的問題，他們往往就不懂得回答，欠缺了知識的深度，等於電腦一樣，不論它多麼會運轉，但沒有了資料（data），它就等於是廢鐵，人也一樣，如果沒有知識、內涵，只靠嘴甜，也是不行的。所以，日後如何在課程上增加學生的知識面，這是很重要的。

【戴】你覺得香港的高中或者大學課程，在未來有甚麼需要加強的地方呢？

【黃】教改的時候，我們有四項關鍵項目，注意 IT（資訊科技）、注意專題研習（Project），注意閱讀，還有德育，我認為中學需要加強的是閱讀，閱讀能夠擴闊知識。德育也很重要，現在我們偶爾也會覺得有些年青人對人的尊重和一些內涵，還是有所欠缺。未來，我們需要加強高中學生的知識面，建立廣闊和較為結實的知識基礎，對於他們將來升讀大學或是出來社會工作都是很重要的。

【戴】這又會不會出現一個矛盾？我們既鼓勵高中生要有四個核心科目，再選修兩至三科，又希望他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同時又希望加強他們知識的深

度，這樣的話，學生沒有可能讀遍生物、化學和物理，理科的深度和廣度就會出現了問題。

【黃】這就進入了另一個領域，高中的新課程有幾個特點，一個是加入通識教育，另一個是將理科改革，引入組合的科學課程，還有綜合的課程，中文科也取消了範文。這些都是當時教改一些重要的舉措，事後評價這些內容到底好不好，我想我們要客觀一點，我認為總的來說，教改是有一定的成績，學生比較活躍，知識得到開拓，但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也需要實事求是，有沒有一些東西做得不夠好，或者你想不到原來另一個做法會更好，這麼多年了，也可能需要一些新的變化，未來教育界還是需要實事求是，不要受外界的影響，切實地去檢討當中的好壞。

舉例來說，當年為甚麼會出現教改，四個核心科目加一個或兩個 X，原因是當年我考會考的時候，要考十科，我們認為讀太多的科目了，希望新高中課程的科目可以減少一些，但同時要維持課程的寬度，這是有矛盾的，又要少，又要寬廣，怎麼可能？於是出現了中、英、數加上通識教育，再加一科 X，現在我們又發現，欠缺了一些知識面，例如，現在學生如果讀理科，他不可能讀上物理、化學和生物這三科，這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情況，因為現代的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和數學是緊扣在一起的，所以將來應該要怎樣發展呢？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當時的決定有當時的原因，現在事後總結又應該要反思一下，當時我們希望知識可以廣闊一些，但現在發現反而是狹窄了，特別是現在的學生學習能力不是每一個都那麼強的時候，讀完四個核心科目之後，加一至兩個 X 已經吃不消，因此知識面才會變窄，這值得我們將來去檢討一下。

【戴】剛好最近教育局好像在做新高中課程的檢討，希望檢討完之後，可以把鐘擺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現在，我想集中談一下大學，大學變成了四年後，多了一年的時間，很多人反而擔心大學課程好像沒怎麼改革，只是多加了一些東西進去，你在大學工作，有沒有發現這樣的情況？這個四年制是否促使大學內部也有課程改革呢？

【黃】最初有人覺得很簡單，那就多加一年吧，但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對的，應該是要改革整個課程，成為四年制，以一個四年課程來取代「三加一」，四年課程不等於「三加一」，但可能不同學校有不同的情況，我希望將來大學可以多投放一些精神在四年制上，完整的新四年制課程可以更加完善。

3. 通識教育、中國歷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

通識教育科

【戴】近年中學課程的討論也頗為熱烈，而且還帶點政治敏感，其中三個最敏感的話題包括國民教育科，另一個是中國歷史（中史），有人認為要強化其地位，初中要改為必修科，最後是通識教育科，它是核心科目。不如我們先從通識科說起，因為是你做主席的時候，決定要增加通識教育，現在有人認為不應該把它設為必修科目，減少其重要性，有人亦建議改革它六個單元的內容等等，從現在來看，你認為有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改善呢？

【黃】首先要說說通識科的歷史，為甚麼它會出現？我記得 1999 年教育改革的時候，最初並沒有通識科，初中之後我們實行文理分流，由於過早分流，於是要成立一科 X，這一科應該要讓文科生多點認識理科的知識，理科生又可以多點認識文科的知識，從而能夠文理兼備，那這一科 X 應該是甚麼呢？我們開始慢慢討論，漸漸就變成了 liberal studies，以前高中的時候也有這一科，這一科的目的也是希望「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後來就用了一個新詞彙「融會貫通」，當時不知道怎麼翻譯 liberal studies 成中文，最後就翻譯成了通識教育，嚴格從譯文而言，通識教育科與 liberal studies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當時對於如何實行通識教育也有不少的爭論，有些人認為只需要議題學習就足夠了，不需要對或錯，能夠刺激學生的思維去批判就足夠，但又有些人認為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也很重要。我個人認為通識教育有三個目的，一個是價值觀、人生觀，第二個是知識面，擴闊知識，第三個是能力，包括溝通能力、批判能力和思維能力，三者都要兼顧，但有人認為議題學習最重要的是能力，知識和價值觀不太重要。後來我也離開了，但據我所知，學科認為應該要走第三個方向，主要著重議題能力，現在卻引起大家的批評，我認為無論如何，這也是教育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應該要從這一科對學生的成長、如何實行才是更好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一科。

中國歷史科

【黃】至於中史問題，當時為甚麼沒有將它列入必修科，在初中也沒有當成是一個獨立的科目，我參加的時候已經定了案，所以我也不太了解為甚麼，但我依稀記得有幾個原因，第一是中史很沉悶，學生不喜歡讀，第二是如果要將中史列為必修科目，也沒有位置可以給它，初中太多科目。

【戴】有些也不是因為沒有位置，但有些學校希望將它與西史合併，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課程統整。

【黃】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是一件很普通也很常見的事，我記得我在北美洲讀書的時候，大學一年級一定要讀美國歷史，讀歷史以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文明等，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香港，由於我們需要多了解自己的國家，中史科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渠道，所以我認為現在社會正在討論中史科將來應該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很健康的討論，教育界和教育界以外也應該去討論。

國民教育科

【戴】雖然國民教育科與你無關，當時你已經離開了，不如你簡單說一下，成立這一科到底好不好呢？

【黃】我認為國民教育也好，甚至不稱它為國民教育，叫國情教育也好，並不一定要成為一個科目，但這個元素可以在教育課程內存在，等於我們有環保教育、健康教育和自然教育，有國情教育也是很自然的事，國情教育可以關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地理自然，不一定要談及那麼多的政治內容，談經濟也可以。

【戴】不應該把國民教育科等同於洗腦教育，我們應該拋開政治，把國民教育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4. 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戴】你本身是搞科技的，以這方面為例，香港將來的發展還能追得上社會對我們的要求嗎？

【黃】在三十年前，香港是四小龍的時候，我們與台灣、新加坡和南韓並駕齊驅，但現在我們經濟發展卻不及它們那麼多元化，我們只是搞金融、航運和貿易，在科技發展及工業發展基本上比以前還要差勁，與三小龍相比更是差距甚遠，這對於製造更多的就業，令經濟更多元化，製造新的經濟引擎而言，是很差的。但很諷刺的，由於這十幾年的教改，我們的高等教育卻發展得很好，我們有多人做研究，在世界上發表最好的文章，我們卻沒有把這些研究應用在生產上。香港社會、政府和工商界必須要好好地深思，香港應該發展一些合適的、創新性的和能力所及的科技，這應該要成為我們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不做的話，將會有很大的困難。

【戴】這就引伸到整個教育改革和經濟轉型脫了節，或者是我們做了某些東西，但內部協調得不夠好，白白喪失了機會，像是剛才你所說的，大學內的科學發明和成就是很好的，但轉化不了成為一個產業。

【黃】我們的基礎研究肯定不比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差，但在產業化、研究與發展方面，我們就差很多，不是說我們不行，而是我們並沒有從事這方面的發展，大家也不重視。在大學內的獎懲制度（reward）也只是發表文章，不太重視研究的項目可不可以轉化成商品，從而促使香港經濟發展，我認為這樣是很不理想的。我們大學的發展方向和衡量成績的方向也應該要轉變，例如，有些人未必發表最好的學術性文章，但他有創新和科技，研究的成果可以換來香港重大的經濟價值，我們需要給予獎勵，但現在卻欠缺了這種獎勵。

【戴】很多人都說香港的創造力不足，年青人的競爭力也不強，這些問題未必出在教育身上，反而在怎麼乘勢轉型的方面做得不足，這很值得工商界人士和社會人士去反思，是不是發生了任何問題都一定與教育有關？其實可能社會的配套也出現了問題。

【黃】除了工商界人士，也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合。舉一個例子來說，最近科技大學一名本科生，他研究了無線控制的直升飛機，結果很成功，他最初並不是想在深圳，而是在香港做的，但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土壤去幫助他，反而深圳市政府不斷地鼓勵他去深圳發展。

5. 大學教育的發展與本土主義

大學的分工

【戴】香港現在有 8 所資助大學，公開大學並不是資助大學，陸續會有很多的私立大學成立，你曾經在教資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工作，負責大學的方向、定位，還有撥款，有幾個問題是大家經常問的，香港的大學資助學位足不足夠？又香港的大學分工合作得好嗎？

【黃】如果大學的學位加上副學士，佔有 70% 入學率，我覺得算是足夠的，這 70% 當中，政府資助的佔 20% 左右，有 40% 不是政府資助，是有空間，但這當然要看政府的財力，最好能夠有更多政府資助的學位。

【戴】政府說大學的學位成本太高，如果便宜一點的話，才能有更多的資助。

【黃】我們不能要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我想談談大學的分工，我認為大學角色的分工很重要，我只說香港教資會的那 8 所大學，數目不多，但分工很清楚，有綜合型、理工型、應用型、教育型，很齊全，這是香港的特色。外國呢，有些地方就只求「大」，其實大學不在於「大」和「多」，而是在於有沒有特色，當然我也明白現在鼓吹研究，大家都向研究型的大學發展，其實不一定要這樣做，有些學校重視研究，有些是教學型，有所分工，這才是理想的。

我以前在科技大學工作，科技大學很清楚是一所研究型學校，它創校之時已經說明了。現在我工作的公開大學則是另一種類型的學校，我們是教學型，而且我們教學型有一個特點，我們用兩條腿走路，一邊是面對面，青少年讀書的地方，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為香港培養人才，而且是培養不同興趣、不同特性的人才，另外，我們培養的科目亦有不同的側重面。

【戴】你也在城大（香港城市大學）工作過，城大又是甚麼型呢？

【黃】城大可以說是比較應用型，專業應用，它有理工科，但它不是綜合型的大學，它沒有醫科、護理或建築。總體而言，我認為大學應該要有分工，這是香港美麗的地方。

【戴】接着就有人批評了，香港那麼小的一個地方，有 8 所大學，分工得很不錯，但卻缺乏合作，你認為這是不是一個缺點呢？

【黃】這是一個小小的缺點，香港很國際化，我們想跟外國合作很容易，香港本地的合作反而不多，這是有待改善的。如果能夠增加合作的話，可以發揮協同效應。不過，30 幾年前，我仍是一名普通教授的時候，我們普通教授層面的來往反而很多，但高層的合作比較少，所以這值得深思一下。

私立大學的發展

【戴】資助大學和私立大學之間，你認為將來的形勢會怎樣發展呢？政府沒有資源給私立大學，它們的發展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狀態，到底香港的私立大學能夠發展起來嗎？

【黃】宏觀而言，教育是全人、整個社會的責任，政府有責任，工商界有責任，家長有責任，學生有責任，公道而言，不能把全部責任都推給政府。政府每年資助 8 所大學，已經花了 170 億，這不是小的數目，如果我們還要把入學率提高，不能全靠政府，民間也有責任。但話又說回來，香港與美國不一樣，美國是先辦私立大學的，哈佛、耶魯辦了三百多年，已經很有名，所以它們可以得到很多捐

款，學費可以收得那麼高。美國是先辦私立大學，再辦公立大學，但香港則相反，政府先辦公立大學，給了那麼多的錢，然後再辦私立大學，卻不給任何的資助，私立大學的確很難去辦的，但在這很難做的過程當中，它們可以如何去辦好？我認為政府可以適當地提供一些津貼或贊助。

【戴】私立大學也有兩種，一種是用本地的資源去辦學，可能以往的歷史中，它是辦專上學院的，現在轉為大學。新加坡卻希望用另一種模式，引進名牌大學在當地辦大學，你認為這一條路在香港行得通嗎？

【黃】我不知道在香港行不行得通，不過我認為這是不容易的，因為大學不是一間公司、一間工廠，它有很多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例如有些學校是幾十年前所辦的，已經沉澱了四、五十年，如果是新辦的，要它移植過來，既要馬上成功，又要經濟獨立，難度並不小。老實說，新加坡現在的這種做法，到底是不是完全成功，我也不太清楚。

【戴】新加坡現在就龍蛇混雜，有些已經倒閉了，有一所芝加哥的，搬來香港了。香港在這方面的引進，相比之下是比較少的，你認為可以嘗試嗎？

【黃】香港現在有開放政策，問題是有沒有人來，現在暫時還是嘗試的階段，據我所知，現在有一所藝術學校和芝加哥的 MBA，等這兩所學校實踐一下再說吧。芝加哥是一所很有名的學校，實力很強，我相信成功的機會率應該也挺大的。

【戴】也要提供土地給他們才行，如果在香港，要求一所私立大學自己租地方或者是買地，那倒不如搞地產比較好，所以也是需要政策的扶持，才能夠出現一個比較多元化的局面。另外，就大學收生的問題，當大學的學位比較多的時候，那麼大學收生的標準就可以比較多元化，當資助大學的學位少，收生很多時候只能看成績，其實你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還是錯呢？

【黃】我想這也是慢慢變化的，以前很多收生都是經篩選的，為甚麼要做篩選？因為學位不足。這等於家裡有五個孩子，以前經濟不好，只可以讓一名孩子去讀書，其他的就要出去打工，現在經濟比較好了，學位又增加了，就可以四、五個孩子都去讀書，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青年人去接受教育，對社會永遠是健康的，所以我贊成開放更多的機會，甚至收生標準也不應該只看成績，應該多元化一些。

大學生過多？

【戴】你同不同意香港出現大學生過多的問題？

【黃】我認為不應該用「過多」或者「不過多」這種過於簡單的答案，這是不全面的，大學生怎麼謂之「過多」？教育是為了甚麼？培養大學生是為了甚麼目的？要先弄清楚這個問題。

【戴】其實大學生是否過多的問題，在外國已經討論了幾十年，英文有一個名詞叫「diploma disease」，即高等教育培養的人越多，但又找不到工作，除了人浮於事外，大學生也會更多地出來示威等。但也有人認為，如果經濟可以的話，教育也是一種權利。亦有第三種說法，不是那麼理想地談教育，也不是那麼功利，沒有功能的話就不用培養那麼多，其實讓人有更多的知識和更有能力，在現代一個強調創新、創意、創業的社會而言，他們會自己製造機會，創造新的工種。

【黃】其實你說得很好，你已經基本回答了我的問題。第一，教育不單是培養人才，亦是一種自我的權利，我生來這個世界，就有權利接受教育，不單有權利接受小學基礎教育，亦有權利接受高等教育，一個完美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第二，就業方面，社會慢慢地改變了，不再是「左手文憑，右手聘書」，文憑是你完成了學習的階段，不一定保證可以找到工作，或者你找不到那個行業的工作，你就要轉型做另一種工作。有些人讀完了大學一個比較普遍（general）的學位之後，再出來讀一個更低的職業訓練，然後是靠它找到工作，所以基本上教育普及，學生更加有創意和能力，更能發展其潛能，最後為社會創造財富。

大學的教學模式

【戴】現在有一種叫「慕課」(MOOC)¹的課程，要學習的話，隨時都可以學習，不過要獲得資格，就得給錢和達到一定的基準。讀完之後，不管是否畢業，也是學到了一些東西。我認為最容易轉變成這種形態的，就是公開大學了，你們有沒有想過也做一些「慕課」的課程呢？

【黃】簡單說一說，公開大學在 1989 年成立，當時香港只有兩所大學，那時候很多青年人中學畢業後直接去社會做事，他們很優秀，只是無法進入大學，在社會工作了四、五年之後，回來公開大學讀書，他們都很認真和有能力的，當時我們以遙距的方式，補足了香港高等教育的不足，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 2000 年的教育改革，我們要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青年人讀大學，所以我們同時辦面對面的本科課程，從幾百人辦起，現在已經有 7,500 人，加上 11,000

¹慕課是最新一種在線課程開發模式。“M”代表 Massive（大規模），一門 MOOC 課程動輒上萬人；“O”代表 Open（開放），以興趣導向，凡是想學習的，都可以進來學，只需一個郵箱，就可註冊參與；第三個字母“O”代表 Online（在線），學習在網上完成，不受時空限制；“C”代表 Course，就是課程的意思。

個的遙距，有接近二萬名學生，所以我們稱之為兩條腿走路，一條是我們仍然辦遙距教學，為香港服務，另一條亦培養年青學生，加入了聯招 JUPAS，因此我們未來繼續往這兩個方面發展。

【戴】這個遙距課程和我們剛才所說的比較開放性、大眾性的課程有很直接的關係，你們有沒有打算做這種課程？

【黃】有，我們有遙距課程和面對面的課程，現在我們是將兩者綜合，產生一種叫「綜合學習」，即有時候是面對面地教學生，有時候則叫學生網上學習（E learning），所以現時我們的課程是慢慢地過渡，出現了「混合式」。你剛才所說的「慕課」是另外一種模式，由於今年我本人是亞洲開放大學的主席，上個月在香港舉辦了亞洲開放大學協會年會，有十幾位校長和 300 多名教授參與，開了三天會議，兩天主要是討論 MOOC，究竟它將來可以怎麼發展，有甚麼困難。

【戴】有甚麼結論嗎？

【黃】還沒有最後的結論，MOOC 相當有效，但最大的難題是，在經濟上如何去維持，因為它是不收費的，要取得學歷的時候才會收費，那這種學歷在社會上是否受到認可呢？現在還不知道。現在 MOOC 發展得最好的，都是一些名牌大學，大家對它們都有信心，但如果名氣不是那麼大的學校，它們去做 MOOC，別人對它們有沒有信心呢？這就不得而知了。我是持開放的態度，未來會不斷地發展，有些人甚至極端地認為它會代替所有大學，因為它們找一些大師來講課，講得很精彩，你聽得如癡如醉。我倒認為不至於此，因為大學有文化的沉澱，在人類社會已經存在了近千年，沒那麼容易消滅的。

【戴】我認為公開大學是有質素向這方面探討，希望香港可以出現一個比較便宜、大眾化，又有大師講學的，新的學習方式。其實不止公開大學，香港可否與內地結成一個關係呢？內地那麼大，如果要普及高等教育，用傳統的方法可能會走得很辛苦，中國大陸對這個「慕課」很有興趣，這很適合起點低，國家面積又大，如何去處理高等教育發展的問題。香港是否可以幫助中國大陸去發展「慕課」？大家的看法和概念又是否一致呢？

【黃】但有一個問題存在，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學校不足，突然成立了一批傳媒大學，或者叫廣播大學，這批大學和我們的遙距大學不同，我們是向倫敦學習的，香港公開大學和倫敦的公開大學是一樣的，所以造成了我們的做法與內地不同，社會上對於內地傳媒大學的肯定性是比較弱的。但我們第一，有堅實的課程，這些課程由香港 8 所大學與我們一起編輯的；第二，我們有導修課程（tutor）；第三，我們很強調考試，但內地的傳媒大學不一定有考試，素質不一

定是最理想的。它們現在也在改變中，如果能夠改變到的話，你說得沒錯，「慕課」在中國一個這麼大的國家是很重要的，即使在 2020 年，國家的規劃也只得 40% 的大學入學率，還有 60%，這些就可以以開放的形式，來全面提升國家的素質。

我認為將來在內地發展這種開放的學習，遙距學習，前景是很大的，不過一定要他們改變這種概念，現在英國的開放大學有 12 萬名學生，英國開放大學甚至會做研究，在英國也很受尊重，其實我們如果做得好的話，在中國一個那麼大的國家，相對而言又不是很富有，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去提升民眾的素質。

國際化與本土主義

【戴】我認為香港的專上院校和大學一向強調國際化，但其實也需要國內視野。過去談的比較多的是國際化，沒有怎麼談及內地，不知道你怎麼看國際化及與內地關係這兩個問題呢？

【黃】有時候香港所講的國際化有一點偏頗，多收一些國際學生就等於國際化，我認為國際化最重要的是提升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一定要懂得欣賞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風俗、藝術，這才是國際化。而且這種國際化的視野，是泛指香港以外的視野，包括世界和內地，兩邊也要看，才能擴闊視野。

【戴】事實上，我們在做國際化的時候，就把自己當成了是世界公民，對內地少了關注。近年年青人當中，多了本土主義的傾向，我知道你不是在香港出生，像你這種在大陸出生，小時候來了香港讀書，今天成為了國際學者，你怎麼看這種本土主義？

【黃】本土主義這個名詞比較新穎，我也不是很詳細知道它真正準確的意義是甚麼，可能本土主義指我們要著重香港、我們自己的地方，但我認為本土主義與國際視野並沒有矛盾，簡單地說，在大學內你屬於哪一個系，哪一個系又屬於哪一間學院，哪一間學院又屬於哪一所大學，一層一層地遞進，我屬於香港這個本土，但我亦屬於中國這個國家，亦是這個世界的公民，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層次。如果我只強調本土，本土以外的東西都不管，那是很狹隘的。我認為要強調關心本港的事務，但同時亦要放眼世界，我們香港甚至要看到後面中國這 960 萬平方公里的事情，這樣才是完整的。

【戴】你在大學內有沒有發現，這個本土主義的出現，是不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內地學生來港讀書，學位、宿位，以至到將來的工作，本地生都不足以跟這些內地生競爭呢？

【黃】最早來香港讀書的大陸學生，都是研究生，因為香港沒有甚麼人讀研究生，後來有本科生是馬會開始的，每年只有五、六個人，全港只有幾十人，目的並不是培訓或者是提供教育給內地人，而是引入尖子學生，來刺激一下我們的思維，擴闊我們的視野。後來這個數字不斷增加，現時已經有 10%，從國際上而言，10%並不是很多，而且這些都是優秀的學生。另外，香港想成為國際級的大學，那是一定要錄取外來的學生，如果哈佛只錄取波士頓的學生，那是不會有名的，北京或清華大學如果只錄取北京市的學生也不會有名，香港也是同樣的道理。

【戴】你認為內地生來港後，有沒有促進內地學生與香港學生的文化交流，並多了些了解呢？

【黃】我認為是比較欠缺的，最初只是十幾人來的時候反倒是可以的，內地生很快就學會了廣東話，現在反而學得比較慢，因為人數增加了以後，只在自己的圈子內溝通。我認為大學應該想辦法，不只是內地，而且是外國來的學生，如何與香港學生交流，我偶爾也會跟同學說，你們去多認識一下外國的朋友吧，他們就說，哎呀，要說英文太麻煩了，其實我們是想鼓勵他們多認識外國的朋友和內地的朋友，有助於擴闊視野。

【戴】其實我也有不吐不快的事情，我曾經在教資會工作，經常要訪問一些院校，約見學生，教資會主要來的都是外國學者，有一兩個是大陸來的，他們也是講英文的，但到了交流發言的時候，有些人（學生會的成員）就很強調要用廣東話發言，因此這樣才能體現到他們的尊嚴，這令外國的學者感到很奇怪，第一，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要求，第二，外國學者也鼓勵他們用英文，但他們卻堅持用廣東話發言，並要求有翻譯，外國的學生又不清楚大家到底在爭論甚麼，曾經在大學的某個場合，一名外國教授起身要求離場，他說這是對他的侮辱，他認為自己已經接受了你們用英文發言，說得不好可以慢慢說，他完全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英文是大家的共同語言，而這也不影響你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認為，學生真的要如你所言，要有一個全球的視野和胸襟，與來自大陸或外地的人有一個經常的溝通，不然我們會失去了一些很好的機會。

「新移民」的身份

【戴】我知道黃教授是在內地出生，小學才來到香港讀書，用現在的語言，你也是那時候的「新移民」，那時候你在香港讀書，習慣嗎？你對香港、國家的感情有沒有變化呢？

【黃】我來香港的時候，年紀還很小，我都忘了是六歲、七歲還是八歲，我依稀記得，我在內地的小學一年級讀了半年，因為我是華僑子弟，要與媽媽回來和爸爸在菲律賓團聚，所以來了香港，用現在的術語叫做「新移民」，但我記得當時數以千百計都是新移民，很多人都不是香港出生的。我也很快就廣東化、本地化，當時來香港的印象已經不是很深了。

【戴】雖然你只是在內地接受了很短時間的教育，但你對於香港的教育還習慣嗎？

【黃】我很難比較，因為當時只在內地讀了半年書，但我的確認為香港的水平比較低和容易一些，如果我沒記錯，我來了香港以後，有一年左右是沒有讀書的，因為找不到學校，之後才讀三年級的，從一年級跳到三年級，那時我倒不覺得很困難。我印象中，內地的算術、語文也教得不錯，香港的英文也是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才開始讀的。

【戴】那對於投入香港的社會，你覺得有沒有困難呢？

【黃】沒有困難，其實我那時候年紀還小，在香港長大，已經算是一名「香港仔」，你不說的話，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名移民，所以有人問我，我也很習慣地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戴】當時有沒有受到歧視？

【黃】當時並沒有甚麼歧視，而且我那麼小，也不覺得。印象中，當時我是住在西區，那時候很多僑眷都是大陸來的，並沒有歧視的問題。當初來到香港的時候要學廣東話，因為我還小，很容易就學會，一年左右已經學會了。

【戴】香港這個社會，其實很多人都是外來人，從外地來到香港，然後在這裡生根，很多人都感謝香港提供了教育和成長的機會，接着就為香港服務，我認為這是有必要繼續下去的。

【黃】這我也覺得是要感恩的，香港在短短幾十年內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城市，是我們上一輩的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們在「沙士」一役，體現了我們香港人的心、團結和勇敢，我們沒有一名醫護人員要逃跑的，所以我要很感恩，香港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現在看香港好像有很多缺點，向上流動不足和樓價高企等，但如果我們冷靜地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優點，安全、文明的社會、有效率、

管理完善，我們需要好好珍惜上一代的成果，並好好地發展它。

【戴】現在經常講「世代的矛盾、對抗」，世代當然會有所不同，大家成長的背景不同，與其強調世代的分別，不如強調世代的傳承，這當然也要經過下一代自己的過濾，下一代也要看看上一代曾經遺留下來的文化資產和優勢，讓下一代可以好好發揮。

【黃】我們中國人經常說「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但我們也曾經年青過，今天的年青人，明天也會是年紀大的人，所以我們要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年青人有朝氣蓬勃的優點，年長的人也有閱歷的沉澱，大家應該互為補足。

政策多面看

1. 芝大商學院棄星取港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從新加坡搬到香港，消息來得突然，特區政府及教育局高姿態表示歡迎，傳媒則凸顯香港較新加坡優勝訊息，究竟真相如何？是否說明香港有能力發展教育產業？還是香港具備成為地區教育樞紐的條件？兩者又有何區別？

踏入二千年，當年的特首董建華突然宣布，在一成八適齡學生可進入本地資助大學的基礎上，大力擴展本地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讓六成以上的學生能攻讀學位及副學位課程，並且進而建議香港應發展成為地區教育樞紐。同時董先生又在經濟不大理想的情況下推動學制改革，從「五二三」逐步推動至「三三四」。曾蔭權接任特首後，繼續推動「三三四」改革，並且提出要發展教育為六大產業之一，以河套地區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用地，當時已有不少評論認為，香港的大學既要滿足本地學生升學要求，同時又要發展國際化和吸收境外高質素的學生，根本沒有擴展空間去實行產業化；同時香港地少成本高，本地或海外自資大學的發展一點也不容易，除非政府能提出優惠政策，否則產業化勢難落實，果然幾年以來，河套地區相對於澳門的橫琴發展緩慢，自資大學發展舉步維艱，產業化宏圖無影無蹤。

話說回來，十年來的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卻取得不少成就，備受批評的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有所進步，八所資助大學國際化發展令人滿意，並獲得國際好評，與內地優秀學生的吸引力亦有所提高，自資學位課程有所增加，並能保持質素，大學四年制改革亦順利開展，大學內部同時進行了課程改革。這些成績得來不易，由於政府並沒有加大高等教育投資，在政策上近年亦沒有大動作，故此發展實在有賴院校和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社會資源的配合支持。

特區反應快積極配合

反觀新加坡政府，其發展高等教育的力度則大得多，除了投入大量經費和提供政策支援外，政府透過EDB（並非如香港的教育局，而是經濟發展局的簡稱），大力吸引外國名牌大學在新加坡設立分校，除了供本地學生升讀外，更期望吸引東南亞學生，將新加坡打造成為地區教育樞紐，有機會更會發展教育產業，十年以來，新加坡吸引了幾所外國名牌大學設立分校，亦吸引了一定數量的東南亞學生到新加坡讀書和留星工作，不過同時亦衍生了不少問題，例如境外教育機構提供課程的質素參差不齊，有部分更中途停辦，境外學生質素差異亦大，有些無心或無力向學，只想往新加坡當黑工，這次芝大商學院自動搬家落戶香港，對新加坡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據了解，芝大商學院「搬家」的原因既有戰略考慮，也有偶然因素，由於芝大商學院與新加坡政府簽訂的合約即將到期，商學院開始考慮「落戶」香港的利弊，香港交通便利，芝加哥的教授可直飛香港，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既可吸引內地優秀學員，同時也是國際城市，亦可吸納在港工作的各國學員，從而使商學院的網絡更國際化及中國化，國際因素和中國因素正是新加坡未能做到的，至於特區政府這趟也算反應快速，自從獲悉芝大商學院有意落戶香港後，即積極配合覓地，並在對方作出最後決定前成功提供摩星嶺地段，終於爭取到芝大商學院搬家，至於日後的發展，就要看學員的網絡能否國際化和中國化，我個人更認為商學院的課程除了要維持與美國本土一樣「原汁原味」外，更應考慮加入中國元素作為選修單元，使到香港分校的課程更具特色。

政策多面看

2.大學的路向

最近參加了一個論壇，主題為「培育二十一世紀人才——中大與港大的前瞻」，討論大學的使命和如何改革，適逢港大慶祝一百周年，中大則是 50 周年校慶，正是回顧與前瞻的最佳時機，故此論壇吸引了三百名學者和校友參與。

中大沈祖堯校長和港大徐碧美副校長從二十一世紀中教育的大趨勢，到分析現時年輕人的特點與新時代需求的對比，進而指出教育需要改革及年輕人需要努力改進方向，這些都是大學未來探索的大問題。

作為是次論壇的評論員，我提出了兩方面的意見。第一方面的意見是期望大學使命必須傳承又要創新。傳統上大學是要培養人才，負起知識力量與社會良心的使命；過去港大更明確提出要為中國而立，而中大則追求傳統與現代及中西文化的結合。這些傳統的使命不但沒有過時，在新世紀更有特殊的意義。

創新須瞄準國家崛起

有不少學者指出新世紀有如下趨勢：(一)全球一體化，但價值多元化；(二)知識更新愈來愈快，知識型經濟已經形成；(三)自由貿易和資本集中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四)中國重新崛起，並成為世界最大的實驗室。這些特點要求大學能培育多元人才，從而促進社會流動，更要求這些人才能夠守護社會核心價值和社會公義，正正這就需要大學落實知識力量和社會良心等傳統的使命，而大學使命的創新則要考慮對準國家的崛起。

目前中國教育發展的一個戰略重點，在於把世界文明引進來，同時推動中華文化「走出來」，故此香港的大學不但可以發揮本地匯聚中西文化的優勢，更要把握機會發揮上述「引進來」及「走出去」的中介角色。現時兩所大學已啟動的部署包括：開辦更多與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有關的課程，以提升本地及海外學生對中國的認識，與內地合作辦學，讓內地高等教育體制盡快學習與國際接軌；吸收內地學生來港就讀、增加本地學生到內地實習或參與交換生計畫，以及開設分校吸納內地及本港學生共同學習等，均會強化香港學生對內地的認識和擴闊其在內地的人脈網絡，無論對學生及香港的長遠發展均有好處。

不過，上述香港的大學發揮的中介角色，會隨着外國教育及文化機構直接進入中國而逐漸減退。未來香港的大學應加強研究如何配合國家的教育文化「走出去」戰略，在合作中尋求雙贏。

全球化亦須本土特色

我對兩所大學未來發展的第二方面意見，是期望大學能破解或者平衡幾個突出的矛盾。圍繞在教育目標，本地的學者已經就以下幾個主軸有不同的意見，而大學領導層的發展策略也會因人事轉換而有不同的側重。

為了競逐國際排名，大學有時被逼跟着「全球化」的共同標準走，漸漸失去個性和本土特色；學者只會重視國際學術雜誌認許的研究，無法兼顧本土研究；而市場導向也會催化大學重實用學科或就業培訓而輕全人教育和人文學科。由於目標的共識未能建立，自然會導致大學發展策略和資源投放出現擺動。

圍繞在具體發展策略的落實，本地大學也需要更好地處理以下問題：究竟本地大學國際化要抓緊哪些關鍵環節？在招收境外學生有限制的情況下，如何處理海外與內地學生的比例？政府資助的大學應否化大氣力發展自資課程？如果政府資助的大學不參與自資學位課程的開發，其他私立大學可否獨力擔負自資學位課程的質與量發展？最後究竟本地大學目前的競爭是否良性？是否應該有更多的教學和研究合作？這些都是兩所大學未來要解決的問題。